

改革开放 30 年来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

李 新 芝

(四川师范大学 政治教育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改革开放 30 年来,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创新,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

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形成;发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8)06-0021-06

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获得了迄今最为迅速的进展,而这一成效的取得首先应该归功于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所提供的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作为推动我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先导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出现的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创新的重要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社会分层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进程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形成的实践基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三代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则使这一理论得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的开创之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成功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现实依据。

毛泽东晚年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认识,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逐渐偏离了经济建设的正确轨道,使阶级斗争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内容。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此时社会分层理论的主题就演变为突出阶级对抗,社会分层的目的是要分清敌友,划分革命和反革命的两大阵营,由此导致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科学分析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

收稿日期:2008-08-15

作者简介:李新芝(1966—),女,新疆石河子人,副教授。

务。”^{[1]182}在他的主持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逐渐成为共识。在1980年初的一次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1]241}。服务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现实需要,社会分层理论的主题就从突出阶级对抗根本改变为强调阶层合作,社会分层的目的从分清敌友根本改变为必须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最大限度地调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社会分层从甄别机制转向激励机制,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现实依据。

二是在继承毛泽东社会分层理论中正确思想的同时,通过纠正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社会分层理论发展中的偏差,拨正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中国化的方向,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方面,毛泽东社会分层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邓小平继承了其中很多正确和有益的成分,如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毛泽东从“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现实需要出发,认真研究了当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新变化,认为根据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政治态度的不同划分社会阶层的分层标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主要是由两部分力量构成的,“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2]205}。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重大创新。但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没有能够始终坚持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情况的科学调查和分析,没有能够始终坚持根据我国社会阶层变化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而只是抽象地强调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对立,错误地进行了长期的阶级斗争,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在社会分层理论方面的错误特别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理。基于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1]182}

不仅如此,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还根据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很多创新性的思想,奠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基础。一是坚持多元分层标准的立场,初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元分层标准体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元分层标准体系,在强调按照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中所处的不同地位来揭示社会的阶层结构时并未否定其他划分标准,他们本人也多次讲到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差别,就体现了从地域、职业、劳动方式看待阶级和阶层划分。在邓小平的多元分层标准体系中,包括了政治地位(着重看现实的政治表现)、经济地位(主要是收入)、职业等。如在考察社会成员的政治表现时,邓小平提出了具体的“三看”标准:“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1]93}依据经济地位把社会群体分为“先富起来的人”、“后富起来的人”;依据职业把社会群体分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等。这些论述,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基本立场,而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二是提出了促进我国社会阶层合理分化的基本原则,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邓小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从社会分层的角度讲,就是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这并不等于允许两极分化,促进社会的分层也决不等于促进社会极端分化。如果社会出现两极分化,不仅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且人民内部非对

抗性的矛盾就有可能演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就会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在促进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兼顾公平的原则,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这一原则对加强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宏观调控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三是提出了促进中国社会阶层合理分化的评价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372}。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制定一切有利于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政策和措施,把物质生产搞上去。邓小平说:“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178}因此,判断改革开放和一切工作包括促进中国社会阶层合理化得失成败的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这实际上是把中国社会分层问题的认识上升到要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高度。

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开创者,邓小平不仅在理论方面为创立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做了很多奠基性的工作,还从实践方面,通过制定和实施很多具体的方针政策以解决实际中存在的突出的社会阶层问题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很多宝贵经验。如通过对社会阶层政治地位进行重新定位,以调动这些社会阶层的积极性。对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进行重新定位就是一个成功例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邓小平得出结论:“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1]89}据此,中共十二大将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一起定位为“三支基本社会力量”。再如制定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使单一的公有制发展到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到开放。这些政策的实施,不仅赋予了人们自主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活方式的权利,使人们有更大的可能来改变自己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而且大大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繁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正是由于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逐步纠正了毛泽东晚年在社会分层问题上的偏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层理论从阶级斗争的工具向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的根本转变,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构建奠定了

基础。

二

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社会阶层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社会阶层内部不断产生分化,原有的社会阶层外部又产生了很多新的社会阶层,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矛盾和冲突也在加剧。如何认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这些新变化,如何正确处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面临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要重视研究社会分层问题,把社会分层问题视为执政的基本问题,并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全面分析了面临的国内外新形势,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现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判断,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江泽民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江泽民第一次正式使用了“阶层”这一概念,并首次明确提出要重视研究社会分层问题,把社会分层问题视为执政的基本问题。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在谈到如何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阶层”这个概念,他说:“我们所有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都应该正确反映并有利于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都应认真考虑和兼顾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4]279}这是“阶层”一词首次在中央文件中得以表达。此后,他还多次使用“社会阶层”这一概念,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新的社会阶层不断产生,“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4]286},要求“全党同志要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4]282}。根据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的考察,江泽民认为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此也是党的重要的群众基础。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江泽民从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的政治高度强调要努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关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只有

这样,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我们认为,江泽民使用“阶层”这一概念,比较“阶级”而言,内涵更丰富,更能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当代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实际;他所提出的“要坚持从新的实际出发,以改革的精神研究和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又为我们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结构演变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了一种应当遵循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江泽民首次使用“社会阶层”这一范畴,有益于淡化阶级意识与对抗色彩,有益于突出阶层意识与合作色彩,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其次,江泽民提出必须正确处理阶层矛盾和冲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明确规定了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协调阶层关系的方向、目的及要求。

1990年6月11日,江泽民在《努力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指出:“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有利于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与和平演变,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集团,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5]235}这一思想,江泽民一贯坚持始终。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还更加明确地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4]539-540};“要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创业机制,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4]540}。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党和国家事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妥善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把一切积极因素充分调动和凝聚起来,至关重要。

再次,江泽民在研究如何推进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现代化进程,总结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出现的实际问题的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邓小平提出的多元分层标准体系。

一是强调新“三看”标准。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指出:“不能简单地

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贡献。”^{[4]287}即:阶层的划分不仅要看经济地位,而且要看“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不仅要看财产来源,而且要看“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要看“贡献”,这是对新的社会阶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的充分肯定。“三看”标准的提出,是江泽民实事求是地对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的新变化正确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的又一个理论创新,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很强的创新能力。二是重视按收入水平来划分社会阶层。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谈到个人收入分配政策调整时,江泽民指出:“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4]550}使用了“先富起来人们”、“中等收入者”、“低收入者”的概念,并明确提出了调整社会阶层结构的重点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一新思想深刻地反映出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变化,即改革开放以来,以职业、收入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分层机制逐渐取代过去的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依据的分层机制。

在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演变中出现的新问题的实践活动中,江泽民也十分重视对新出现的社会阶层明确地进行政治定性。如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的社会阶层政治地位的认定,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他们与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4]286}在中共十六大报告更进一步指出: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4]539}。这一提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是从改革开放的实际出发、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需要出发得出的重要结论。这一理论创新必将极大地调动新的社会阶层的积极性,带来生产力的大发展。

总之,江泽民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 and 执政党肩负的新任务的现实需要,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

三

中共十六大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我国在经济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更为复杂,利益关系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全面、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现状和发展趋势、社会阶层的利益差别和矛盾,是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基本依据和重要保证。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胡锦涛又以卓越的理论思考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增添了很多新内容,使这一理论更加完善。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贯立场,更加重视社会阶层结构的分析,更加重视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动问题的研究,并以此作为制定正确政策和策略的基础。

胡锦涛多次强调要紧紧把握我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在2006年7月举行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指出:必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全面兼顾和实现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利益,充分发挥社会各阶层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要坚持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方针,切实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工作,尊重他们的劳动创造和创业精神,凝聚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导他们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6]。我们党的重要理论观点要适应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执政条件的发展变化,适应我国人民利益要求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同时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诸多新课题”^{[7]14}。只有及时准确把握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政策调整社会阶层结构、协调阶层关系,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而努力奋斗。

第二,提出了协调阶层关系、实现“阶层和谐”这一重要命题,并提出了实现“阶层和谐”目标的基本思路 and 具体举措,进一步完善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

我们知道,阶层关系是社会关系中一个重要方面,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和谐相处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胡锦涛首次提出了协调阶层关系,实现“阶层和谐”这一重要命题是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他指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对于增进团结、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7]31}那么,怎样实现“阶层和谐”的目标呢?胡锦涛认为要用和谐思维来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即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和谐共生、共处,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7]41},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为发展提供良好社会环境。

按照“和谐思维”的新思路,胡锦涛还就构建和谐的阶层关系提出了新举措:一是承认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的经济利益差异,积极采取措施协调经济利益关系。经济利益矛盾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变化的物质经济根源和集中反映,因此,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经济利益矛盾,妥善协调各方面的经济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是当前人民内部经济矛盾的突出表现。对此,胡锦涛多次强调重视解决这一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还提出了改革个人收入分配制度的新原则:“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7]39},还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7]39}。二是维护阶层平等权利,构建合理阶层关系。胡锦涛指出,“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涉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8]。强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7]28}。要“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必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三是必须着力建设和谐文化,巩固阶层和谐的思想道德基础。没有和谐的文化,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就没有阶层关系的和谐。在当今中国,建设和谐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核

心,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和合”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世界优秀的文明成果,立足当代实践,体现时代精神,引导人们树立和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使和谐的理念成为全社会的重要价值取向,“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7]35}。四是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7]37}。这包括优先发展教育,他指出:“教育公平

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坚持教育公益性,加大财政对教育投入”^{[7]37},“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完善和落实国家对农民工的政策,依法维护劳动者权益”^{[7]37},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等。

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提高,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思想保证。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4]569}正是有着这样一种高度的政治自觉和理论自觉,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不断地推进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成功构建了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并使之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指导。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4]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 [5]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续编)[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 [6]人民日报,2006-07-13.
- [7]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8]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Theory Development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of 30 Years

LI Xin-zhi

(Political Education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3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gtiao succeed in realizing an innovation of the Marxist class analysis theory and a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the course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the actual problems emerged in the change of social structure of contemporary China through a creative application of Marxist class analysis theory.

Key words: contemporary theory of China's social stratification;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Hu Jingtiao

[责任编辑:李大明]